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中国国际关系 现代化

刘建飞 ◎ 著

中国外交

国际关系现代化

全球治理

合作共赢

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

认识国际关系新常态

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

不断推进我国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中国国际关系 现代化

刘建飞 ©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 / 刘建飞著. —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150-1755-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372号

书 名 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

著 者 刘建飞

责任编辑 徐铁忠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编辑部 (010) 689288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7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755-6

定 价 32.00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 1

- 一、现代化与国际关系现代化 / 1
-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7
-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国际关系 / 19

| 第一篇 |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与环境 / 21

- 一、主权国家的演变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 21
- 二、时代特征与主题 / 23
- 三、世界格局转型与国际体系变革 / 45
- 四、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重构 / 55
- 五、国际关系呈现新特征 / 63

| 第二篇 |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66

- 一、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哲学基础 / 66
-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69
- 三、人类主义 / 71
- 四、合作主义 / 78

**| 第三篇 |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目标形态
——新型国际关系 / 88**

-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 88
-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 94
- 三、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 / 97
- 四、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着力点 / 104

| 第四篇 | 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 / 118

- 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118
-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 133
- 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140
- 四、实施以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战略 / 160
-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重构 / 165
- 六、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 168

导 论

在现代社会，外交已经很难与内政截然分开。外交首先要为内政服务，但同时也影响、塑造内政。一个善治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外交通常也是成功的，在国际上形象好、朋友多。这样的国家不仅通过外交为国家治理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而且还可以学习、吸收别国的治理经验。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对外关系的现代化。中国在推进对外关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都以推进对外关系现代化为努力方向，进而实现整体的国际关系现代化。

一、现代化与国际关系现代化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首要关键词是“国际关系现代化”。所以要理解本书的内容首先要明确“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含义。而要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现代化”，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从语文角度说，所谓“现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1]亦即非久远的过去，跟古代是对应的。当然，不同的人群对“现代”的理解又有区别。在西方学界，现代一般是指16世纪以来的时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以1500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古代中世纪史，下卷为现代史。当然，1500年只是一个模糊时间概念。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世界发生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0页。

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史学界，以 1840 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而现代史则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划分沿用苏联的划法，以政治事件为划分标准：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则为世界当代史的开端。

西方将 1500 年作为现代史开端是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西方人看来，从 1492 年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现代化进程开启并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代。这个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基本吻合。而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与资本主义兴起有密切关系。所以西方人眼中的现代化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扩张的时代。

西方学界的这种历史观有其合理性，尽管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就是因为以这个事件为标志，中国开始了被迫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欧洲以外的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以西半球为例，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到 1500 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 2500 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1]虽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非西方世界经历了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所造成的深重苦难，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看，现代化则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体现，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在经历了苦难和无果的抗争之后都选择了走现代化道路，试图通过现代化来保住自己的“球籍”和文明。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确实通过现代化之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甚至还跻身强国行列。当然，生产力进步只能是评价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之一。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许多地区的古老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也正因为这样，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探索

[1]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13 页。

超越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从字面理解,所谓现代化就是“非现代”向“现代”方向转变的过程。“化”字作为词的后缀,就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1]由此推理,“现代化”就是由古代社会的非现代化状态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化由欧洲发端,然后推向北美及其他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是亚洲现代化的排头兵。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即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至于现代化的内涵,可以说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给出的“现代化”的词解是“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还有人将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化。这些都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正是由于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才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和主要推动力量,而其他文明,即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厚重,经济实力也不弱,但是由于仍然处在农业文明时代,所以都纷纷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些非西方民族和国家后来要学西方,要走现代化之路,起初也只是想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也是将工业化放在首位。西方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没有后者做支撑,所谓的工业化也就没有任何威力。所以,中国将科技现代化作为“四化”之一。至于国防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肯定是建立在先进科技武装的现代工业基础之上。中国重视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是与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使得中国极其重视国防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一直是激励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也是真理。

无论是先进科学技术还是工业化,都是不断发展的。现在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生产水平,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大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0页。

业”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所以,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来说,并不是“现代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它们需要不断追随现代化进程,否则就会落伍。对那些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的“后进国家”来说,它们追赶的目标不是过去的现代化国家,而是当下依然在不断创新、进步的国家。中国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可能比 19 世纪中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要高许多,但是目前的中国只能说是处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按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到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距引领现代化的国家仍然有相当大差距。从这个意见上说,现代化进程是没有终点的,至少是现在还看不到终点。所谓“后现代”只是在哲学、艺术等领域才有意义,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是无意义的,或者是极其久远的事情。

从工业化和先进科学技术角度来解释现代化,还只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现代化。实际上,伴随着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所以现代化还有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内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1]我国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对现代化的解释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2]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对外关系的现代化。对单个国家来说,它如何处理同

[1]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30 页。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7 页。

其他国家的关系，就是对外关系；对多个国家来说，它们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简言之，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这两个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用“国家间关系”一词时，更多的是表达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其考察对象就是发生关系的两个国家，相对应的英文词是“BETWEEN”；而用“国际关系”则不仅限于双边，也指向多边，其考察对象是众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对应的英文词是“AMONG”。

所谓国际关系现代化，从字面解释，就是使国家之间的关系由非现代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变的过程。同现代化本身一样，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内涵与标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古代国际关系相比较，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主权国家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权形式上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1]这个基本特征至今未变。可以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是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开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现代国际关系”。当然，这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史学的观点。有中国学者以中国版的世界现代史为依据，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2]不过，从“基本特征”来看，1917年后的国际关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非常抢眼。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国家主权放在首要位置，意识形态利益和国际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总现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同步。如果严格考察，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以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为起点），比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晚了100多年。不过，西方史学

[1] 胡正豪：《关于现代化和国际关系的若干思考》，《国际观察》1999年第5期，第14页。

[2] 张宏毅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1917—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界将 1500 年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就意味着工业革命之前近 300 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工业化有紧密联系。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地理大发现到商业和航海业的大发展，从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议会制度的演进，这些都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些条件和基础也适用于国际关系现代化。而国际关系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工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准则为野心勃勃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设置了一种约束，避免了无限制、无休止的混战，从而促进了以英国革命为先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传播”。^[1]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未能阻止战争，但是毕竟“设置了一种约束”。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世界主权”，从而为主权国家进行国内治理提供了巨大空间。

确立主权国家的地位，还只是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开始。随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演进，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也不断被推进。其中的机理完全可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属于上层建筑，工业化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国际关系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最初，主权国家的存在范围仅限于西欧，它们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广大的殖民地以及其他地区的“非现代国家”则是无主权的，或者是有主权但却不被尊重的，比如中国。后来加入“主权国家”行列的国家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已经有 193 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立是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另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将主权国家的待遇扩展到全球。

然而，同现代化进程没有完结一样，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也没有完结。国际关系中仍然有许多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国际关系的状况也不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关系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然，不同的国家对国

[1] 刘德斌：《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革——历史的考察》，《长白学刊》1996 年第 2 期，第 77 页。

际关系现代化状况和演进方向有不同的认知。本书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考察国际关系现代化问题，以期为其进一步演进描绘蓝图。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从 1840 年就开始了，是被西方强拉进这个进程的。然而，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算成功，尽管有一些成就。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对现代化模式即发展模式或道路的选择。所以，这里着重论述一下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一是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一党威权政治相结合。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但是当它们实现工业化后，都开始向西方模式演进。然而在中国，很难预料在实现工业化后会实行西方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它已经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其内在的逻辑。

第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前提。

同西方模式相比，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贯彻自己的路线和纲领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发展模式。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步步地走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步步逼近中国。从那时起，无数志士仁人开始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并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所用过的办法，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用过了，但是都失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都是想学习西方，然而，西方这个老师不仅不帮助学生，反而总是欺负学生，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先生老是侵略学生”。^[1]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刚刚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俄国。领导了辛亥革命并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到了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一度出现过政党林立、诸子百家相互争雄的局面，西方各种思潮都涌入中国，仅社会主义流派就有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但是最终共产主义占了上风，共产党在中国政坛崛起。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己任。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其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中国共产党虽然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在组织性质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爱国主义者，要维护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的大旗，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在抗日战争中，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得以消除，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表现非凡，深受欢迎。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同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一道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以《论联合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各种政党进行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思路。然而，中共的建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响应。随后进行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以冷战为国际背景、代表中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在硬实力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就打败了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支持下的，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各种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和她所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充分的力量主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促进国家统一，另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走过弯路，但是也有一定的成绩。改革开放就是在经过十年“文革”大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重大战略转折。如果没有此前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政策很难顺利实施。

改革开放，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的。从沿海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从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建设和谐社会；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够实现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分不开的。在这种体制下，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西方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对口援藏，中国内地各省市与西藏各地区结成固定的援助与受援关系单位，效果良好。“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这样词语的出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而此前，国际

社会普遍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比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 20 世纪末还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是否能够适应 21 世纪的世界，在这些方面依然留有很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1]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其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政治前提和这个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没有这个前提，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逻辑。在共产党领导地位这一点上，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方向限定。

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按照既定的纲领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将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这个目标，从未动摇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是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模式。那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3]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有了这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创造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于是就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到了 1975 年，四届人大还提出在 20 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1] [日]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1—652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1 页。

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历史证明,苏联模式是有很大弊端的,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上,苏联模式是失败的。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时讲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因为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在现代化上是先进的。他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

向西方学习,摒弃苏联模式,只是要摒弃苏联模式中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要摒弃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从改革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改革的内涵:“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2]也就是说,改革只是要改掉现存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抛弃现有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初期,与学习西方相比,中国更注重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重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是到了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随着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才更加重视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搞市场经济的样板。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长期奋斗的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国情,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另搞一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成果就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5 页。

[2]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7 年 10 月 25 日。

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理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现实，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必须对外开放，同时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有社会主义制度，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市场经济，否则社会主义就难以立足。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内在逻辑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启动改革开放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即使到了苏联东欧剧变后，在西方欢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和“历史的终结”之时，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模式从它发端时起，就已经限定了其方向——社会主义。这一点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出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对“西化”、“自由化”、“和平演变”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此同时，在摒弃苏联模式时则显得很不情愿。就以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为例，由“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体现出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165页。